

单靠放假烘托不了“老年节”

■燕农

在很多人的思维定式中,节日往往要与假日挂钩到一起,似乎不放假不成节。比如三八妇女节的时候,呼吁给女同志放假;六一儿童节的时候,建议给孩子们放假……结果是,节日直接兑换成了半天假日,而节日本身的要义并没有在社会上铺陈延展。这种情势中,即便不观照政府对 GDP 增长因素的考虑,在重阳节放假,恐怕也很难烘托出一个金色的“老年节”。

在目前的放假制度框架下,即便重阳节放假,想来最多也只是一天假期,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,一天假期能让多少人实现探望父母的愿望,很值得思考——太多漂泊异乡的人们,恐怕只能窝在他乡给父母打个电话。

不是说不支持重阳节放假,而是带薪休假制度依然停留于休闲纲要的纸面,民众没有自主选择“拼长假”的权利,太多异地相望的家庭只能将阖家团聚的时点确定成春节和国庆长假。所以,重要的不是重阳节多放一天假,问题

的关键在于增加长假供给的同时,落实带薪休假制度,让子女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老人。

调查显示,目前我国约有 40.7%的老年人仍是靠家庭供养,四成老人认为自己是家庭的负担,只有约 24%的老人能够依靠养老金生活,农村很大一部分老人要靠劳动收入养活自己。“中国式养老”面临诸多困局:家庭养老功能弱化、机构养老服务供给紧张、养老金面临缺口及保值升值难题……这些问题如不能尽快理顺,靠法定“老年节”和放假,无力在社会

层面上构建“孝亲敬老”的格局。

其实,无论是网友呼吁重阳节放假,还是当下人多、钱紧、资源少的“中国式养老”困局,放在宏观层面看,都是社会对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。在我们更多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很长一段时间内,忽视了民众休假权的增量赋予和“老有所养”的铺陈积淀。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的情境下,需要重新评估和平衡公平与效率问题,让稍显孑然的“老年节”能有所依托。

贱卖尊严

■文/言者 图/春鸣

日前,一青年在汉口街头摆摊“卖脸卖跪”——只要有人愿出钱,就可朝他脸上吐口水,或让他下跪磕头,甚至可抽他一耳光。该男子自称姓秦。他认为,创业是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,只要放下面子就能赚到钱。现场虽有人围观,但没一个人“消费”。

商品社会,创意无限。为创业,不惜抛弃面子在街头贱卖尊严,创意可谓离奇,勇气也可嘉。只是,文明社会的商业行为,不但要符合公俗良序,还需恪守法律,让人吐口水、抽耳光,在“卖方”是有失人格尊严,而对“买方”,不仅有悖文明和社会道德,且有违法之嫌。即便“愿打愿挨”,也不宜提倡。

文明与愚昧、新奇与荒诞常常是一纸之隔,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固然不错,也可能颇吸引眼球,但被围观并不代表受追捧,有时也会是自取其辱。



“采血破案”背后的权力失范

■徐剑锋

只为揪出学生宿舍里的小偷,最近,山东滨州学院上演了一场采集学生 DNA 的行动,5000 多名本科男生全部被一一采血验 DNA。对于学生表现出的疑虑,现场的警察只有一句回答:“安静,不要说话”。

警方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的相关规定和“案件排查工作需要”可以进行 DNA 采集,但并不等于就可以“宁可错杀一千、不可放过一个”。从滨州学院本科男生被采血验 DNA 来看,有三个方面值得商榷:其一,警方侦办案件走的是逐步缩小嫌疑人目标的“路线”,但滨城区 38 起学生

宿舍盗窃案的侦查情况只是表明“不排除学生盗窃的嫌疑”。缺乏精确的办案方向就大海捞针般地对全校男生进行采血排查“一网打尽”,实在是一种懒政;其二,DNA 采样主要是用来充实嫌疑人犯罪证据的,大范围采集实质则在对全体男生做“有罪推断”,行政命令的介入极易引发学生的“不安”;其三,撒网式地采集 DNA 比对排查,牵涉到 50 多万元的公共成本,这岂是警方为了破案就可以随意大笔一挥的,真不知这个权力是谁给的?

滨城区警方“高调”采血破案,总给人一种急于求成的感觉,暴露出的办案作风粗暴、办案手段粗放等问题不应小觑。说到底,是警方缺乏

“以人为本”的 DNA 基因。想说的是,即便破案心切,也应始终把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,在选择侦查路径、办案方式时切不可自我为中心而“劳民伤财”。

群体性采血破案的背后,实际上 5000 多名本科男生都被警方列为了“犯罪嫌疑人”,这是对学生权益的极大“无视”;而一天之内就能顺利地完采血,效率之高也并不是学生太“听话”,而是缺乏维权意识。面对失范的公权力闯入校园,不仅作为弱者的学生要强化法律意识,敢于为自己的正当权益抗争作为,学校管理者也应当好学生权益的“保护伞”而不是甘当幕后推手。

自我截肢的疼痛,请我们共同来承受

■唐伟

一把钢锯、一把小水果刀、一个裹着毛巾的痒痒挠,保定硬汉郑艳良用这三样简单的工具,在家中将自己患怪病的整条右腿锯下。如今,同样的怪病还在他左腿上无情蔓延。郑艳良希望好心人支招,医治好自己的怪病,重新为妻女撑起一个家。

如果不是痛不欲生,相信没有人会有“自我截肢”的勇气;如果不是迫不得已,相信也不会出此下策。2011 年,53 岁的重庆农妇因贫穷无钱医治腹部积水,用菜刀剖开了自己的肚子,放出腹部积水自愈,震惊世人。如今,这一幕已然再现,切腹与截肢之间何其相似,殊途同归之下,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,是什么让他们做出了如此震撼的选择?

我们当然有很多理由来为自己开脱,比如

医学不是万能的,不能医治的怪病谁也没有办法。这当然可作为一种理由,但底层患者的无奈,其所处的痛苦与彷徨,又靠谁来解决呢?

我们无法对公共责任和社会关怀做过多的指责,甚至也无法对自我截肢的行为做出合理性的判断。因为谁也不知道,其行为选择之前,是否进行了所有的抗争,并最终处在穷途末路上。制度不是万能的,救济也并非就无处不在,仅就单纯的极端个案来说,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当事人的真实诉求,以及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探入,或许对于事实,对于当事人都更有好处。

如果不出意外,如此惨烈的案例,势必会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,并引来对制度和责任的强烈指责,事情最终会朝着“媒体报道——领导重视——职能部门积极行动”的路径前进。但对每个人来说,真正需要也力所能及的事情,不是作为旁观者进行评说,也不是作为道德说教进行

评价,更应从人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:假若自己是当事人将会作出怎样的选择,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,如何自救以及寻求外在的救助?

我们所处的时代,其实并不缺少爱心,但缺少如何利用和发挥爱心的理性。很多时候,我们往往会被极端的事例所激怒,并因此左右自己的情绪,以旁观者的姿态故作矫情。要知道,任何一起极端的案例都可能发生,而如何从中去表达和实现自己的责任,并因此上升成整个社会性的救助,从而推动从民间关怀到政府责任的实现,才是检验国民素养的试纸。

那么,当务之急是什么?是设身处地的思考,是感同身受的努力,是将自我截肢的疼痛,转化成整个社会的疼痛,并动员一切力量解决从技术到资金,再到心理的需要,让处于困境者看到希望,这才是社会品质和人文素养的体现。

“复印纸就像复印钱”还叫窗口服务?

■司马童

百姓前来办事,市场价复印一张纸只要两毛钱,到了部分政府办事机构收费超过两三倍;有的花了高价钱还要遭遇“门难进、脸难看”的冤枉气。这是记者在安徽合肥一些政府机关看到的现象。

假如不是讳莫如深或避而不谈,有些办事窗口的为民服务,倒不如称作“宰民服务”更显贴切。以新华社记者采访到的实情为例,有些地方的民政部门,婚姻登记和办证不收钱了,但随之引入一个“复印 5 毛,照相 30 元”的窗口服务,照样赚得盆满钵满;又如一些地方法院规定,复印卷宗只能在本院复印室内提供服务,而且每张 1 元,厚厚一本材料往往就要收取上千元。

复印纸何以能像“复印钱”?这块经营“肥肉”当然不是人人可得。一来,这些复印店几乎都是只此一家,你若不愿意接受“高价服务”,那就费时费力地来回跑;二来,复印也许“不值钱”,但附于这些“为民服务”上的权力商机,才是那些“挨宰”顾客们绕不过去的无形障碍。正是吃准了很多“识时务者”的“花钱买方便”,薄薄的一张复印纸,也便具有了远远超越市场价格的“暴利”潜力和优势。

“复印纸像复印钱”还叫窗口服务?倘若没有记者采访、媒体介入、舆论喧哗,在很多时候,这样的质问,也许根本就是白搭。所谓“官字两张口”,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回应质疑的说辞:窗口单位设立综合服务区本意是为了方便百姓,这些服务都是社会化经营,在收费方面与本单位无任何往来——其实,谁不知道,如果没有熟人、不托关系,谁有那种在这些地方搞“社会化服务”的好运?

权力商机化才有复印暴利化。若在以前,这种权商合谋的“服务怪胎”,人们也许只能“见怪不怪”;但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的今天,一些为民服务的政府办事窗口,仍是阳奉阴违地不愿舍弃“权力盛宴”,那就说明,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,他们搞教育活动的政府办事窗口,仍是阳奉阴违地不愿舍弃“权力盛宴”,那就说明,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,他们搞教育活动的宗旨意识多是“玩表演”。

其实,比起“三公消费”的巨大财政支出,像那种为办事群众印份材料、拍张照片的服务投入,即使全由政府部门“免费包揽”,也不算一种苛求。更何况,当前眼下,对于那些成本价的服务花费,老百姓也少有不肯自掏腰包的。人们真正心有怨气的,其实是那些打着“窗口服务”的幌子,却干着权力寻租、共享其益的“暴利谋私”。这根本不是什么“社会化经营”,无非是“立块牌坊”掩饰其贪婪欲望。